本文描述的现象基本上还是宏观层面的，作者刘学智的观察是，“三纲五常”的观念在两汉之际开始孕育，魏晋至隋唐时期持续地低迷，直到宋元明时期开始重提，并逐步加强。

我们认可作者的基本判断，但限于本文的篇幅，这一观点还是相当的笼统，作者的分析过程也有省略过多的问题，以至于部分的中间结论并不显然，甚至可能是错误的。在作者的基础之上，可以有更进一步的研究。如：其一，为何向来被视为中国前现代时期所达到的一综合国力的顶峰，但却没有像前后汉宋两朝一样，流行 “三纲五常”的观念；其二，五代十国和南北朝时期都是天下大乱，为何继五代而起的赵宋时期，思想家重新重视起“三纲五常”，而承南北朝的隋唐时期则不然，作者对此的解答过于简单；其三，虽然宋代的理学家尤其是朱熹大力提倡“三纲五常”，但由于理学本身在两宋的社会影响相当有限，那么两宋时期的社会风俗，是延续隋唐的相对开放自由，还是已经有着朝“三纲五常”所要求方向变化的趋势；其四，“三纲五常”与程朱理学的体系之中，具体的关系、地位是怎样的，王阳明的心学被视为对程朱学的反动，是否也表现为对“三纲五常”的反对；其五，“三纲五常”是否阐发了孔子的本意，又与孟子、荀子的思想是否有冲突；其六，即使是“三纲五常”概念活跃的汉及宋元以后，但“三纲五常”的具体要求则未必一致，不同时期的变化又是如何；其七，已有学者提及，朱熹的思想中有着强烈的抑制君权的“虚君”倾向，这又该如何和人们一般认为的“君为臣纲”所要求的近乎绝对的服从相协调；以上所举，亦当也只是“三纲五常”话题可引申问题的一部分，既然“三纲五常”被人们投之以极大的重视，则必然牵涉甚广，背后的意义甚深。

就笔者目前所看的论文来说，似乎中国的学界还是摆脱不了斯大林那套“封建”社会分期的机械观点，偶有一两人表现出对此的不赞同，但大多数人还是将其作为以一约定俗成之名词使用。当然，目前确实是没有能够替代“封建”概念所具有的通用性、普适性的词出现，但这也相当程度是学者们的不作为，难道，当下的学术界，竟然连清代乾嘉考据的那一点勇气都没有了吗。